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群体

一群传递生命希望的人

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器官捐献者和移植等待者之间架起一座生命之桥。

他们珍惜每一个生命,珍爱每一份爱心,他们为了挽救更多的器官衰竭患者、为了帮助更多的家庭实现助人的心愿,一直在默默地付出。

他们最早接触捐献者家庭,他们为捐献者家庭提供细致的服务,他们会一直关注捐献者家庭。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对于协调员来说,时间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日期没有工作日和休息日之分,地点也没有省内和省外之分。他们随时准备在任何时间去任何需要的地方做任何需要做的事。

他们是任何时候出现都不合适的人

作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动员患者亲属能够接受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的理念,在患者去世后把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病人,让其获得新生。

协调员面对的都是即将逝去亲人的悲痛中的家庭,可是他们却要开口跟患者亲属去讨论死亡、提出器官捐献,也许他们在任何时间出现都是不合适的,可是他们又必须出现去和患者亲属沟通。

“沟通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那种整个家庭沉浸在悲伤、绝望、无助的情况下。”浙江省首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曹燕芳说。很多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亲属不理解的眼神和委婉的拒绝。“有一次,一位先生遭遇车祸,他弟弟提出要在哥哥逝世后捐献器官,但母亲拒绝给我们动员器官捐献的沟通机会。”曹燕芳回忆,“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母亲当着我们的面大骂小儿子,其实那也是在骂我们。”

协调员郑方是金华市的一位红十字志愿者,她完全利用自己的私人时间义务从事这份工作,没有报酬,但从没有犹豫。2011年的一

天,她在报纸上看到有位教师因为看望学生遭遇车祸,已经脑死亡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作为一名志愿者,郑方每天都会去医院看望这位老师,并为老师做一些生活护理:擦身、肢体被动活动等,又通过自己的关系为她的家人在金华找到了短期租用的房子。由此和老师的家人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后来,在一次聊天中提到了器官捐献,老师的丈夫同意器官捐献,但最后由于老师妹妹的反对没有实现捐献。

患者符合器官捐献条件并且其亲属已经有初步捐献意向的,再经过协调员对亲属的动员,能成功实现捐献的也只有三分之一,而另外三分之二的动员工作,往往被亲属委婉的拒绝。

“虽然我们很希望亲属能够在悲痛中做出捐献患者的器官帮助其他等待器官救命病人的决定,但从不强人所难。”曹燕芳说。对于协调员来说,更多的是站在患者亲属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将心比心,他们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得到尊重,即使是拒绝捐献。

时常与家属一起经历生死离别,其实协调员也是普通人,正如36岁的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姚海艇说的那样,“有时候心里压力很大,看着家属悲痛万分,自己有时候也会心情沉重,但是想到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却带给另外好多人重生的希望,心里也会得到些安慰。”

他们是一群没有休息天的人

对于大部分协调员来说,这份工作是他们兼职。器官捐献往往在晚上或节假日,他们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参与工作,但从没有怨言。

2011年7月,曹燕芳接到在丽水山区的一位潜在捐献者的信息,她连生活用品都没时间准备就带着器官捐献的资料连夜赶到当地,从一开始部分家属拒绝、犹豫,到最终同意捐献,协调好交管部门

的支持,一共用了4天4夜的时间,期间她连衣服都没换。在过去3年多时间中,她加班工作在100天以上。

协调员俞欢有好几次下班刚到家,就接到电话通知需要马上出发,丢下不满一周岁的女儿,匆匆赶去和捐献者家属见面。协调员何炯为了完成一例捐献,整个国庆长假都在医院度过;姚海艇经常是在下班后,自己开车到医院开展患者亲属的动员工作。

很多时候,捐献者的部分亲属在省外的老家无法到浙江完成知情同意的手续,协调员还要赶到外省去签署知情同意书。时间对于捐献者和可能接受移植的患者来说都很宝贵,关乎能否顺利实现捐献以及捐献器官的质量。

何炯为获取安徽临泉籍的捐献者家属的知情同意法律手续,从杭州一早坐火车到合肥,再转汽车到临泉已经是半夜12点了,为了不影响工作,第二天一早赶到患者亲戚家中。取得知情同意文书,即刻赶回杭州,又马上投入到另外一例捐献工作中;2012年2月,为了完善相关的捐献法律文书,省器官捐献办的两名协调员晚上10点多从杭州出发到安徽广德县,半夜在村支书家门口等了近半个小时,一直等到村支书开门,请他帮助出具相关的证明;姚海艇和家属连续赶路,到云南大山深处获取法律文书;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时间,曹燕芳和两位司机到安徽涡阳县取证,来回14小时的路程再加上捐献者亲属办理临时身份证,24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为了完善手续、最大限度地缩短取证的时间,协调员们风雨兼程、披星戴月工作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是捐献者亲属的贴心人

做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要获得捐献者家属的认同需要付出无数以心换心的努力。

“只要有捐献的案例,就说明我们正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消逝,一



曹燕芳(左)、俞欢(右)在《中国梦想秀》节目中为器官捐献者家庭圆梦。

个家庭的悲苦。”曹燕芳说,当亲属做出捐献的决定,就意味着他们为了帮助别人、避免患者的器官功能在维持中衰竭,要放弃对患者的维持治疗,每次面对亲属那种两难选择,我们真的是既难过又被深深的感动。所以一个专职协调员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动员和劝说,更多的是给予悲痛中的家庭以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站在捐献者家庭的角度,提供细心的帮助和服务,做捐献者家属的贴心人。

浙江省首例器官捐献者冯周发是一名外来务工者,在器官捐献成功后,曹燕芳和同事还提供完备贴心的服务,她细心询问家属要给患者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样式的衣服、衣服要如何穿,每一条都用本子详细地记录,并亲手给捐献者穿上衣服。

捐献者孙永海的妻子晕车,去机场接她的时候,姚海艇提前准备好了晕车药;在捐献者徐雨文生命最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协调员除了生活上关照以外,几乎每天都会陪徐雨文的父母聊天、开导安慰他们;从外地赶来的亲属,协调员会事无巨细地安排他们的生活,并做好开导并安慰工作;来自不同地方

的捐献者身后事的办理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协调员也会根据捐献者家庭的风俗习惯,陪亲属去买捐献者过世后要穿的衣服;协调员还要联系殡仪馆为捐献者开通绿色通道,协助亲属处理捐献者后事,协调员几乎成了殡仪馆的“熟人”。

这些都是小事,就是因为协调员把捐献者的亲属像亲人一样看待,才会发现他们的需求。可也就是这些小事让人倍感温暖,使协调员和捐献者家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由于器官捐献理念没有被广大的普通群众所接受,很多时候捐献者家庭会受到误解,他们会第一时间找协调员倾诉。

“第7例器官捐献者胡欲辉的妈妈生了个儿子,我第一时间收到了胡欲辉爸爸发来的报喜短信,孩子满月后又收到了宝宝的照片,现在照片还存在我的手机里。捐献者马阳峰的妈妈准备怀孕快一年了,因为她担心年纪大怀不上,所以还让我帮助咨询领养孩子和辅助生育的事。2013年6月的一个晚上接到她的电话,兴奋地告诉我怀孕了,我是由衷的为他们高兴。”曹燕芳说。

捐献完成后协调员还会及时告知捐献者亲属有关受者的恢复情况;逢年过节,协调员也会给这些爱心家庭打个电话,或者寄个贺卡,表示问候和感谢;家属有人生病了也会找协调员帮助联系医院。从事协调员的工作,心理压力大、工作不分昼夜,很多协调员还是一直坚持着。何炯的话也许道出了他们坚持的原因:当捐献工作结束时,亲属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时,当我想到又有患者因为我的努力而获得生的希望时,我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曹燕芳、郑方、何炯、俞欢、姚海艇等只是协调员这个群体的代表,还有许多从事在协调员工作的人员:麻华成、柳迪、朱茜、吴飞娜、吴菲、盛金桥、龚青云、周峰、王珏颖、叶青、徐娜、方丹、雍涵、许悦闻、严磊、华永飞、唐莉等等,他们都在协调员的岗位上努力地工作着。

作为协调员经常会被问到:面对死亡不害怕吗?“我会告诉他们,因为敬畏生命所以不害怕,反而会有心疼。”就如同郑方说的:“捐献者是天使,我们愿意做这些天使的守护者,守护他们进入天堂。”

丽水市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属胡映杰

天堂里,辉儿在微笑



胡映杰夫妇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三个孩子。

2011年7月15日晚,刚刚从缙云县城探亲回来的16岁少年胡欲辉正准备走向马路的对面,此时距他家的小超市不过几十米之遥,就在这时,一辆小轿车呼啸而过,胡欲辉倒在了血泊之中。

当时正在超市门口的胡映杰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被撞倒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子,他只是随着人流疾步而去。当发现不省人事的儿子时,他的大脑一下子“完全空白”了。

他机械而又火速地抱起儿子,急忙送往缙云钟氏伤科医院。经CT片检查显示,胡欲辉的颅脑大

面积严重挫伤,且没有了自主呼吸,必须马上进行双侧开颅手术。听着诊断结果,胡映杰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来。很快,胡欲辉在一片哭声中被连夜推进了手术室。

7月16日凌晨6点多,胡欲辉被推出了手术室。经过专家会诊,得出的结论是:胡欲辉没有自主呼吸,脑功能消失,生命属不可逆状态。听着这个结果,全家人陷入了极度无助的深渊之中。

7月16日晚,坐在家中床沿上的夫妻俩一边断断续续地絮叨着,一边不住地落泪。正当巨大的悲伤笼罩着他们时,妻子胡小青突然开

口了:“如果我们把孩子的器官捐出去,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得到重生?”听到这句话时,胡映杰突然“心动”了一下:在儿子被推出手术室后,这个想法,曾在他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而如今从妻子嘴里听到,却比他自己想到更为振奋。原本抱头痛哭的夫妻俩突然一下子止住了,此时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用来悲伤,因为他们要“做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7月17日早上,一夜未曾合眼的胡映杰打开了电脑,在百度搜索栏里输入了“器官捐献”,对着显示屏,他一条条认真地浏览着,在一

旁的,是双眼还未消肿的妻子。

7月17日中午,胡映杰拨通了缙云县红十字会办公室的电话,表达了他们“愿在儿子离世后捐献器官”的想法。当天下午17时,浙江省红十字会、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协调浙医一院ICU有关专家组成的3人工作组,抵达缙云。

听到这一决定,家里的老人、亲戚无法理解、更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年过六旬的奶奶抓着胡映杰的手,撕心裂肺地哭喊着:“辉儿没了眼睛,他就看不到回家的路了……器官不全,他到了那边身体也会不健康的……”老泪纵横的一席话,听得在场的人潸然泪下。

事实上,胡映杰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把孩子能留下的东西都留下来,我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7月19日,胡欲辉遭遇事故的第五天。上午10时,胡映杰与浙江省红十字会签订了捐献器官协议书——这让他的儿子成为浙江省第七位、丽水市第二位人体器官捐献者,他表示在胡欲辉离世后,愿意捐出其肝脏、肾脏和眼角膜。

“家属意见”栏是捐献器官协议书上一直没有变过的部分,也是凝聚泪水分量最重的部分,甚至,人们无法想象,当“同意”二字落笔时,这对农村夫妇的内心是有着多么浩瀚的大爱。

在身边的亲朋好友哭成一团

时,这对憨厚博爱的夫妇给了彼此一个坚定的眼神,然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希望,辉儿能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胡映杰顿了顿,接着说,“如果可以,希望受捐者尽量年轻些……”因为这样,辉儿生命延续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

在众人渐渐离开后,有人看见,在一个偏僻的墙角下,夫妻俩抱头痛哭。

7月20日8时35分,胡欲辉走完了他16年的人生之路,病房里,溢满悲痛欲绝的气息。紧接着,他的遗体就要被推进手术室了。这时,只见眼里噙着泪的胡映杰抿紧着唇,一一掰开那些紧拽着儿子床沿边上亲人们的手,其中有妻子的、还有母亲的。很多亲人们不愿放手,从病房一路跟到了手术室外,他们都想最后看一眼尚且“完整”的辉儿,这都被他一一拒绝了,“辉儿会理解我们”,这个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男人这样安慰着大家。

即使在儿子即将被推入手术室进行器官获取手术时,还有亲友问他:“就这样吗?”

“就这样吧!”这是胡映杰在儿子身边说的最后一句话。

亲人们从最初的不理解到最后“松手”的心理煎熬,在医院内得到了庄重的回应:医院挑选了最好的医师、护士、助手参与手术,“大家都希望用一台漂亮的手术,告慰去世的胡欲辉”。

通过一个小时手术,医生获取

了胡欲辉的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他们将这些珍贵的器官小心翼翼地存放在组织保存液中,驱车火速奔赴浙大附属一院。

这个过程,胡映杰和妻子不但没有追悔,反而拦住了所有守候在手术室外的亲人,“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吧。”然而,夫妇俩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车子驶去的方向。

7月20日下午,在浙大附属一院里,肾脏被移植给了一名10岁和一名42岁的尿毒症患者;眼角膜移植给了一名25岁的年轻女孩;肝脏移植给了一位患血吸虫性肝硬化已经10多年的女患者。

所有人都赞扬这对父母的“大义”,让生命的价值得到了升华,可在他们的心里总有一张笑脸,那就是他们的辉儿。

仅有感谢是不足以衡量生命的厚重,这对善良的夫妇给了移植等待者重生的希望。当胡映杰和妻子得知四位受捐者恢复情况良好时,他们终于在满腹的伤痛中寻找些些许欣慰:辉儿在某一个地方,正在和自己一起看世界,这世界的点点滴滴,他也能感同身受。

2012年11月2日,胡映杰夫妇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孩子,小儿子和辉儿出生的时间只差了几个小时,妻子胡小青觉得这是老天冥冥中的安排。她说,她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如果是她自己她也愿意这么做。